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江苏产业升级

## ——“经济与管理学”专场综述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既面临诸多机遇，也存在不少挑战。其中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世界经济成长周期和我国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提醒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才能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更好的质量和效益特征，为未来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省份，江苏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化程度决定了其在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发挥领头羊作用。

在此背景下，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经济与管理学”专场学术会议于2016年10月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参会的江苏省内外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等约130余人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江苏产业升级”的主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高处着眼、科学谋划，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强技术创新管理着手，从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创新、引导产业升级着手，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会议研讨成果为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江苏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下，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社会总供给结构优化，而社会总供给结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基础。因此，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成为现阶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洪银兴认为，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创新驱动产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方式。随着全球市场需求疲软和国内结构调整进程加快，部分传统产能在新形势下逐渐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包袱，例如江苏的钢铁、船舶等产业就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就需要设计相应的政策体系，依靠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引导产业创新，推动江苏产业迈向中高端，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不可或缺，但在政策制定之前需要明确政策执行对象，确保政府政策目标与经济行为目标相一致，力争传递通路畅通，保证政策执行效果。第一，产业政策的手段和导向要转变，变“提供政策优惠”为“提高企业能力”。要明确产业政策不是对某一产业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宜直接出台对企业行为进行干涉的政策和条例。第二，政府干预要预防管制过度、避免管制不足。政府应当减少对要素市场的价格干预，提供企业

竞争的基本准绳,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性投资机制,优化地方政府的竞争性行为。第三,优化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制度环境,促进公平、有效竞争的制度环境,是利用市场机制淘汰过剩产能的重要保障。

同时,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着眼于江苏发展新格局与产业升级面临的新形势。南京师范大学蒋伏心教授认为,面对东西双向开放、先发优势要素丧失和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交汇的新格局,江苏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坚持开放导向、集成创新和长短期政策相结合,深化发展共享经济,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第一,坚持开放导向,实现由承接产业转移主导的东向战略与向外转移的西向战略融合升级,实现由相对被动“东向让渡”到相对主动“市场开拓”的战略提升。第二,坚持集成创新。依托优势产业投资和生产全球化来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重新定位江苏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节点位置。第三,深化共享经济,实现空间一体化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第四,坚持长短期政策相结合。实现微观灵活性与中宏观前瞻性优势结合,使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技术创新管理

与会学者提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而加强技术创新管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依靠创新汇聚融合高端要素,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动力、构建经济发展新优势、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要举措。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技术创新管理具有天然的结合点,加强技术创新管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

第一,引进高端人才,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大力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构建引智

成果发现推广体系。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组织实施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集成。

第二,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机制,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力度,支持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建立覆盖企业初创、成长、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支持体系。探索鼓励和促进研究开发、科研成果转化的便利化措施。引导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给予普惠性财政奖励。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支持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创新。

第三,改革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机制,提高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市场体系。减少对科研创新项目实施的直接干预,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赋予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更大的支配权、决策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规范有序交易流转。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

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区域发展各项战略之间的协同性,开创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与会学者认为,在引领经济新常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江苏必须站在中国发展全局乃至全球共同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既要“谋势”,又要“取实”,更要“做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格局中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多作贡献。

第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重大举措。江苏全省各地和各行各业要强化融入意识,巩固提升苏南对外开放先行先导优势,加快建设苏中、苏北对外开放新高地,培育沿海地区发

展开放型经济的新增长极，推动各地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商贸、物流、旅游、产业、工程、海洋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的率先突破。着力促进企业“走出去”，开展科技创新、信息交流等多方面国际合作，打造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境外合作载体。

第二，大力拓展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促进“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苏北、苏中高速铁路和苏南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港口和航道网建设，提升公路网通畅性和安全性，推进综合客货运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在拓宽有形空间中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形空间。实施“网络强省”战略，加快建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第三，推动三大区域共同实行“跨江融合”。坚持协调“南中北”，提高“三大区域”发展层次，苏南地区扎实推进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以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为重点引领现代化建设；苏中地区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内生动力，推动苏中与苏北结合部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加快发展，以融合发展、特色发展为重点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苏北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强化区域经贸合作联系，切实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全面振兴步伐。

(蒋伏心、白俊红、郭化冰、张新星)

### “管理与经济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 创新驱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

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创新驱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途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江苏从制造大省发展成制造强省的主战略和下一阶段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江苏是我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传统产业比重大，制造业基础较好。然而，江苏产业的生态环境压力也很大：高端产业不成规模，外资高科技产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高产值低附加值问题突出。反过来，由于江苏科教资源和人力资本丰富，研究型大学数量优势突出，而且在率先发展创新型经济中，更拥有非常明显的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势。因此，江苏有条件使整体产业进入中高端，甚至部分产业成规模达到高端水平。

江苏要推动产业中高端，首先要让产业类型进入中高端、让全球价值链嵌入环节进入中高端、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培育并推动中高端的新产能。江苏产业创新要对接科技创新，一是鼓励产学研协同创新，鼓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创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创新的组织行为；二是将大学科技园建成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和创新创业基地，成为高端产业的集聚地；三是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四是制定研发投入在比例和投向两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江苏还需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并解决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营销问题，发挥先行者优势，及时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标准。

#### 政策干预不应超过其“可行边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培）

产业政策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政策应当具有可识别性的特点。一个政策越具有选择性、差别性和含金量时，就越要具有可识别性。

第二，产业政策应当具有激励相容的特点。任何政策干预都会面临政府政策目标与经济行为目标是否相容的问题。与政策干预所产生的激励-反应效应直接相关的是，具有差别性和选择性的政策措施，并应尽可能避免导致市场价格信



号扭曲。

第三，产业政策应当具备利益权衡的特点。经济学当中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和卡尔多改进理论都是基于自我实感的利益判断，对比这两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中的案例，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同类攀比和异类攀比的利益判断，这说明一个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是将该政策放在利益权衡的可行边界之内。

第四，政策出台后应当具备传递通路。一个政策是否有效，要考虑该政策的通路是否通畅。

第五，产业政策应当具备可评估性的特点，这是避免政策任意性和补贴“泄漏”的必要条件。

此外，对政策的评估必须有一个时间期限，没有时空限定的政策评价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当权衡利弊得失、分析其收益成本，实际上就是要评估该政策的执行是否有价值，而对市场的干预也应当在政策的可行边界内进行干预。

### 利用新比较优势推动江苏产业升级（南京大学蒋伏心教授）

产业升级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路径，而培育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优势是产业升级的战略实施关键。也就是说，只要地区能够顺利培育出新优势，经济就能够持续增长。

对江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业升级路径的考察，应置于新发展格局视野下进行观察。在新对外开放格局、新空间竞争格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等形成的转型压力下，江苏的新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要素集聚，战略空间叠加以及产业调整弹性这四个方面。江苏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优势源于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开拓型企业家及优势产

业的集聚；创新要素集聚优势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供给、创新投入规模和全球创新要素集成上；江苏战略空间叠加优势源于江苏是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经济区与长江经济带、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战略交汇点；江苏产业调整弹性表现在江苏产业规模、专业化优势与层次性、梯度化特征共存。

### 开放集聚创新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江苏省常州市科技局副局长戴亚东）

在产业结构不完善，高新产业比重低等背景下，为了应对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缩小经济差距等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常州市通过开展“科技常州”行动引进了创新资源，形成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科技创新模式，在利用研发和技术服务的同时，带动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主要的举措有：一是引进纤维分解科技等研究项目的高新团队；二是举办“518”展洽会，实现了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三是形成以科教为核心的氛围；四是引进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合作。这些举措不仅大幅提升了常州的经济总量，培育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技术人才和企业，而且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点：首先是产业定位要准，其次是行动要早，最后是持续坚持。由于，企业对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政府需要做好产业引导的角色定位。此外，优质的科技资源仍然稀缺，在未来需要错位发展，扬长避短，聚焦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持续地探索创新大格局下资源集聚的新路径。

（郭化冰、张新星整理）

## “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要素” 学术聚焦综述

2016年10月21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江苏理工学院承办的江苏省第十届社科学术大会学术聚焦专场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常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叶英姿等出席开幕式。来自江苏省内高校、党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及论文作者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会议，围绕“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要素”的主题展开研讨。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奇，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先后就“创新的新要素和新模式”、“中国经济：形势及政策——兼论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等议题做主旨发言。

### 以改革促进转型升级，以创新支撑新经济发展

王建华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际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常态，这对江苏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江苏作为全国发展先行省份，在“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上已取得较大进展。今后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加快推进“新经济”建设，把发展的重心、

资源和空间稳步转移到“新经济”的培育上。在此背景下，聚焦“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要素”这一主题，从理论的维度、以智慧的视角探讨经济新常态下江苏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与会学者围绕新经济及江苏的发展机遇、瓶颈制约、路径选择等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并认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期。以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动能，必将让位于以技术、智力、市场等要素投入的创新动能。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路径。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强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要素支撑发展新经济，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徐之顺认为，新经济的重要特征是技术水准的领先，通过新技术的转化应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新产业和新模式则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配备能够促进和引领产业发展的新商业模式；新要素的核心是掌握新理念和新技术，运用新资本和适应新模式的人力资源。他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就要不断推进科技等方面的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江苏的技术创新走在全国前列，

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0.5%。徐之顺表示,纳米材料、软件信息、物联网、石墨烯、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相继涌现,为江苏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浙江、上海、广东等先进省份相比,江苏的新经济还相对滞后和薄弱,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重点难点。

面对上述现实,学术理论界应积极加强新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建言献策、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有力的学理支撑。学者认为,应围绕新经济发展,进一步把握新发展理念与新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通过关键技术创新,把江苏的资源优势变成现实的新经济优势;搭建平台,运用市场的力量引进稀缺资源,促进各类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集聚;优化投资结构、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真正把各类资本投向新产业新业态。

#### 创新驱动需要资本性金融保障

“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又可分为前端科学发现、中端技术孵化、后端的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由于创新型项目的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很大概率出现很低的收益甚至亏损、同时有小的概率获得较高收益。因此,在创新过程中需要风险投资家、技术专家、企业家之间的协同,从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从推动创新的角度看,现有的银行融资形式与创新型项目融资需求之间还难以形成有效衔接。”范从来谈到,金融分为债务型金融和资本型金融两类:债务型金融即现有银行的常见

形式,以还本付息为交易形式,无法获取高额回报,自然要努力降低风险,创新型项目往往不具备其对融资对象的要求。而资本型金融可形成资本、股权,对剩余利益有索取权,比较适宜那些几乎没有抵押物但增长更快、风险更高、盈利也更丰厚的创新性项目。

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来源,外源融资也不可或缺。而内源融资本质上属于资本型金融;外源融资也分为债务型与资本型两类。

学者认为,推动内源资本型融资向外源资本型融资发展,能够使创新投资的高风险由少数承担主体向众多承担主体转移,增加风险承担主体以降低或缓解个体风险,通过利益共享来实现风险共担。“因为如此,大量高风险的创新活动才得以实现。”范从来谈到,无论是内源融资还是外源融资,其资金的注入都是以形成资本和股权的资本型金融为主,资本型金融是驱动创新的重要金融安排。他认为,需加快发展资本性融资,从政策层面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打造多层次股权投资中心,推动江苏经济借力资本型金融实现创新驱动。

#### 引导生产要素流向新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叠加在一起,并相互影响、放大和扩散,使得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出现两难局面。简单的刺激经济会与结构调整目标相背离,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和金融风险加大。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然途径。

学者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

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灵活性及其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恢光平认为，以往中国一些行业和产业没有很好地适应需求变化，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石奇谈到，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投资过度发展。他认为，必须实现财政资金投向优化，侧重于催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也有学者提出，去产能能够提升生产要素效率，从而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引导生产要素加速流向新经济，使新兴需求和供给能力持续结合，强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化解产能过剩，为先进生产力腾出发展空间，加快将增长动能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持续增长的新动能接续逐渐退出的旧动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潘冬、于超整理)

**“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要素”学术聚焦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创新的新要素和新模式（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范从来）**

中国经济走出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必须靠创新，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科技创新具有复杂度高、难度大、可行性低、可采纳性差等特点，使其充满技术、信息、市场和融资风险。从资金的进入角度看，必须优化制度安排，使高风险与高收益相匹配。

当前，创新投入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然而内源融资并不能充分满足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需要，因此外源融资必不可少。外源融资能够解决创新投资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因为剩余索取权的出现使投资者在承受创新项目高风险的同时，获得高收益。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内源融资还是外源融资，其资金的注入都是以形成资本和股权的资本型金融为主，而资本型金融是驱动创新的重要金融安排。

股票市场是资本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性的股权投资是资本金融驱动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包含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等机构投资形式。来自这类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具有更强的投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无疑是金融方面重要的创新驱动者。因此，机构投资人的培育、发展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私募、有限合伙制、多轮投资及对赌协议等运作模式。在制度



政策层面,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加大对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培育和引入力度,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股份化改制,建立私募股权投资体系,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在主动与风险资本对接的同时,也要理性地发展政府的引导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创业投资,鼓励企业家转型为风险投资家。

###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石奇教授)

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经济学进退失据,供给经济学应运而生。供给经济学认为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使得供给侧出了问题。要通过减少政府管制、降低税负等恰当的激励手段让供给变得有效。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供给体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不足,传统产业的产能和房地产的库存过剩,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的同时负债过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累积。

结构问题造成要素比价体系的变动,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化解产能过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成本、消化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五个方面入手,配合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为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

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线。

### 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兼论“供给侧结构改革”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恢光平教授)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突出表现是经济增长不健康、不均衡、不可持续。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民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过于依赖“两高一低”,同时面临着就业压力和通胀、通缩的双向压力。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以牺牲国内消费来支持投资和出口为代价,以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为代价,脱离了经济发展为人民幸福的根本目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数据也表明,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下行压力加大。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主要矛盾集中在供给侧,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依靠市场的主体——企业家、创新的主体——企业和科研人员以及改革的主体——官员,点燃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引擎,更好地实现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引领制度供给三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于超、潘冬整理)



# 孙中山与现代中国

##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缅怀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弘扬中山思想和博爱精神，2016年10月21日，以“孙中山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中山陵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美国等地的150多位嘉宾和学者参会。此次会议共收到46篇论文，与会学者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者，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对整个革命的进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江苏省档案馆徐立刚研究馆员认为，在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出身而加入辛亥革命阵营者共同推动辛亥革命进程的新旧交替之际，南京临时政府组织的内阁存在着权力分配失衡、选人用人失当的问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恭忠副教授重新考察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前后会党的关系，指出“洪门民族主义话语在提升会党形象的同时，也遮蔽了会党的某些真实面貌。孙中山本人对此厚爱有清醒反思，对会党的性质做出更加平衡的判断”。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闻慧斌处长指出，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在烈士

的褒扬和抚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崔巍副研究员考察了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务实外交实践及其效果，认为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务实外交开始走向实践，以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吸取了清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误，并取得了一定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官方对外收回权益运动的开始。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傅邦宽分析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华佛教总会。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隋淑英院长等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宣传动员思想，指出孙中山坚持革命宣传要服务于武装斗争的需要，要抢占敌人的舆论阵地，注重多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动员。

### 孙中山与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对孙中山先生评价甚高，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民革南京市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万东委员就孙中山“振兴中华”的论述与“中国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华”的论述，是孙中山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全国人民的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民革南京市委吴力能则就孙中山的初心和共产党的初心的一致性进行探讨。吴力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成就早已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的目标。南京市委党校黄科老师认为后继者应该不忘初心，关注民生，爱国若命。贵州安顺学院政法学院罗宪志老就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进行了探究，指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是极为深邃的，既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又能中西合璧，这对于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他指出政治道路必须要合乎国情，要坚持中央集权下的有限民权，要基于真正的平等实现公平正义，要传承孙中山的“服务到的心”的思想。

#### 孙中山的思想

孙中山的思想得到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在革命思想之外，孙中山在许多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值得后人学习借鉴。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范方镇副研究馆员梳理了后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读历程，民革南京市委文史委员会王仲山副主任分析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民生主义关系，指出孙中山不但赞成、支持和接纳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寻求社会主义及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帮助。中山陵园管理局孙中山纪念馆研究部高萍萍副主任回顾了近五年来关于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研究，指出大陆学者围绕着孙中山的民权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演变、实践与启示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雪很讨论了孙中山的“政”、“治”分权思想，指出在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位较为系统地阐述在中国实现从传统行政到现代行政转变

的思想家，他吸取古今中外行政文化，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思想。孙中山的政治分权思想对民国政治影响巨大，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轨道的关键理论依据。上海社科院林其琰研究员考察了孙中山的道德文明建设思想，认为孙中山道德文明建设思想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泛滥的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发掘与弘扬孙中山道德文明建设思想对于推动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烈士后代吕玲指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锋副研究员研究了孙中山的人才梦思想，指出这一思想在人才价值维度，视人才为立国之道，充分尊重和关爱人才；在人才选拔维度，坚持选择优秀人才，积极推动人才选拔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在人才开发维度，崇尚任人唯贤，欢迎引进外部人才；在人才教育维度，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做到因材施教；在人才目标维度，高度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王培智教授梳理了孙中山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具体实践，指出“孙中山民本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发展、升华的阶段，也是孙中山以民为本的思维过程、革命的实践过程、民本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谢世诚教授就民族复兴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振兴中华，复兴民族，是孙中山先生毕生孜孜追求的夙愿。而其构建的民族主义，是实现这一夙愿的重要支撑和抓手。南京金陵中学张昌宁高级教师考察了孙中山的教育立国思想，指出这一思想包括以下要点：教育为立国之本的

理念建树；教育事业的培养目标和应用方法；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大众教育普及。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李昌娟、王建就孙中山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进行了研究，指出孙中山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对近代中国局势的研究以及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探索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成，对于当代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李建源则从重要文献——《建国方略》出发，分析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从心理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进一步剖析了孙中山在构建国家蓝图的所思所想。会上，有学者探讨应如何利用互联网加虚拟现实技术让孙中山研究更加深入，立论新颖，引发与会学者共鸣。

#### 结 语

除了以上三大专题外，还有学者就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政党文化、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女权运动、外国媒体报道中的孙中山逝世、孙中山与凯末尔之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研讨会将有助于孙中山研究的深化，达到了预期目的。孙中山研究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薄弱点，期待学界今后在孙中山研究领域推出更多优秀成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郭洋）

#### “孙中山与现代中国”主题研讨会专家观点：

#####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贵州安顺学院罗宪志）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

山民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1. 主张有限制的民权。民权就是“人民去管理政治”，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但这种民权是“有限民权”。孙中山认为，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极端平等自由会导致暴民政治，变成无政府。因此，中国应当采取中央集权下的有限制的民权。2. 人民享有“四权”确保善政。这“四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孙中山认为，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3. 政府实施“五权”确保善治。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一个民主立宪政体，“五权宪法”即将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与中国的监察权和考试权结合，形成五权，分别由考试院、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和监察院行使。设立考试院和监察院可以有效地克服西方“三权分立”的弊端。因此，“五权分立”既有效地弥补了“三权分立”的弊端又发挥了其长处，同时符合中国国情。4. 按“权”“能”分离原则，主张“政权”与“治权”分立。孙中山将政府本身的力量称为“能”，即治权，而把人民管理政府的力量称为“权”，即“政权”。为了实现“善政”“善治”，他极力主张“权”“能”分离。“政权”和“治权”分立的精神核心就是使人民获得真正的民主，使选举的官吏既真正成为人民公意的受委托者和执行者，又成为被选举者和被控制者，确保人民达到“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善政和善治。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尽管因为其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思想具有社会主



义的特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政治道路必须要合乎国情。中国当今在顺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只有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纪潮流，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能进步。2.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应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使自由、民主权力在党的领导和宪法、法律的规范下行使。3. 基于真正的平等实现公平正义。应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范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每个人的真正平等权利。4. 传承孙中山“服务道德心”思想，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识。为人民服务是每个公民，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具有的“党性”情怀。要把“为人民服务”内化于心，养成“服务道德心”，逐步形成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良序发展的公民政治道德人格。

### 孙中山与洪门民族主义（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李恭忠副教授）

在近代中国，洪门有着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基于民族主义的视角叙述洪门的历史起源一时蔚为潮流，由此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可以称之为“洪门民族主义”。

最晚从19世纪初开始，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着“复明”、“绝清”之类的说辞。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者和激进知识人从政治层面来解读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说辞，将它等同于民

族观念，甚至强调民族斗争是天地会固有的传统。1903年底到1904年初，为争取华侨支持，他在刊布于檀香山的公开文告中提到，康、梁保皇派“去同族而事异种”“失身于异族”；“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理举义，责有应尽”。孙中山在这里没有直接点名洪门宗旨，但是行文中暗含如下逻辑：洪门宗旨=种族斗争=革命。他明确采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将“洪门”与“革命”“民族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洪门的“民族主义”性质由此得到彰明。

辛亥革命以后，洪门的“民族主义”性质在孙中山那里得到集大成式的表述。他虚化具体史事层面的叙述，将天地会的创立背景设定为明末清初的抗清运动，将天地会创立者设定为明朝遗民，而将叙述重心设定为天地会的宗旨和功能——保存和传播民族主义。由此，洪门、“反清复明”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被清楚地划上等号。当年出于革命的需要，他们事实上倡导了一种狭隘的民族概念。而清廷瓦解之后，当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多族群并存的事实、族群关系急待整合的显示形势，要求他们告别狭隘的“种族/民族”概念，转向一种侧重于族群并存及融合的宽泛的民族概念。进入民国以后，孙中山努力“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也就是“中国民族”。这种结合而成的民族/民族主义，显然是一种基于国民、国家、政治等建构性因素的宽泛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

随着后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主义话语再度迎来巨大市场，“洪门民族主义”不免仍

以实用主义方式被取用，乃至歪曲利用，这一效果实非辛亥前后孙中山等人的本意。

### 孙中山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广东省委党校李昌娟 王建)

政治伦理思想即社会政治生活中规约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伦理价值体系，包括基本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

孙中山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为核心价值目标。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需要一个良善的“有能政府”。为此，孙中山提出一系列阐述官民关系，实现民主政治、构建良能政府的思想。一、“权能分别”。孙中山认为要将民主政府建设成有良好能力的政府，良能政府不仅是让民众掌握政权，政府自身也要具有治理民众和为民众办事的能力，民众的权力与政府的能力要达到一种平衡，也就是“权能分别”。让民众掌握政权，让社会精英掌握治权，政府替人民治理社会，即贤人政治、精英政治。二、“有能政府”。有能的、高效率的民主政府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权能分别”下，民众保持“主人”地位，能够充分运用民权，能够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支持政府做事；二是国家政府的各部门机构权责分明，互相平衡制约又互相支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三、“良善政治”。建立一种“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良善政治是孙中山在政治伦理层面的理想。孙中山建设民主政治和良善政治的设想有赖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即政府与民众双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

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加强，另一方面是政府中的“诸葛亮”依靠自身的道德力量和政治能力构建一种道德的、民主的政治体系。

孙中山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对近代中国局势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成，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当今中国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就是要建设一个好的政府、善治的政府。为此，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孙中山建设政府的心得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一是“人民为主、官吏为仆”，与之相对的是服务型政府的公民本位理念；二是“公仆”是为民众办事的“汽车夫”，转换到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下，即政府及政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者。构建服务型政府，首先要转变传统行政思想中已不合时宜的观念，从管制向服务、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三是提高政府对公众需求的服务能力。现代政府公务人员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开阔视野和提高能力，使自身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以应对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日新月异的新观念、新矛盾、新技能等。四是制度支持。我国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构想和理念倡导上都远较制度建设先进，制度上的不足已成为制约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瓶颈。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按照等级的区分，为社会中部分人——上层豪富权贵者提供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为了整个社会公众服务的，它必须实现对全社会的公平公正，确保社会全体成员一概能享受到平等的服务。

## “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研判 学术沙龙综述

2016年11月4日,由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承办的江苏经济热点观察沙龙在南京举行。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刘惟蓝、省商务厅副厅长朱益民、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等领导,以及南京大学张二震教授、于津平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卜海教授、江苏省委党校祖强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可申教授等近40位全省从事开放型经济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研判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判。

### 一、十三五开局之年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从总体上看,今年以来,江苏省开放型经济在较为不利的外部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全力以赴促进外贸回稳向好,不断提升外资利用效率,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可以说,“十三五”开局之年的江苏省开放型经济运行平稳,并且稳中有进、稳中有好,不乏精彩和亮点。

从外贸总量看,今年1—9月,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24394亿元,同比虽然下降2.7%,但降幅明显收窄,并且在同期全国外贸总值所占比重略有提高,达到13.9%。

一般贸易继续走强。前三季度的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1661.1亿元,增长6.1%,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47.8%,占比比上半年增

加0.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475亿元,增长5.3%;进口4186.1亿元,增长7.5%。一般贸易走强的趋势表明,江苏开放型经济中的外贸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并且将会对全省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后续拉动作用。

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成效突出。前三季度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出口速度增长较快,分别维持在10%到24.4%之间,超过15%以上的有罗马尼亚、俄罗斯、泰国、菲律宾、缅甸、巴基斯坦等6个国家。远远超过对美国(2%)、欧盟(3.3%)日本(-3.6%)。

利用外资总体企稳。2016年1—8月,全省新批外资项目数1837个,同比增长16.34%,其中新设及净增资3000万美元以上项目数447个,同比增长32.64%。协议注册外资24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08%;实际使用外资164.45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0.69%,但降幅明显收窄,比2015年同期收窄了18.65个百分点。

外资利用效益明显提升。全省51家重点企业中2016年上半年主营收入同比增长、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有33家,占比64.7%,其中主营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0%的有22家,超过20%的有14家。新兴产业外资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出现了一批主营收入增长超过50%以上的企业。



46个外商投资的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占比90.2%。

开放型经济的新型业态模式扩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南通叠石桥家纺城被列入政府市场采购贸易试点，3月起每月出口都超10亿元，到9月底出口突破21亿美元。一大批省内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项目已经近200个，其中超过5000万美元的新增投资项目9个。

## 二、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但其总体环境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机遇在于：

一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无论是外贸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的趋势，还是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互补优势，或者是江苏与国外主要合作伙伴的关系等，都没有发生改变和逆转。尽管目前全省的外贸进出口仍然是负增长，外商投资重点项目中有少数项目进展一般，甚至出现较大问题乃至停滞的现象，但其占比仅为9.8%，并且其原因涉及多方面因素。

二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正在逐渐积聚。首先，国家宏观层面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本届政府先后已经出台了16个支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既立足当前稳增长，又着眼长远调结构，含金量高、针对性强，得到了地方、行业和企业广

泛好评。其次，各部门、各地方敢于担当和克服困难，狠抓政策的不断推进和落实，形成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改善的工作合力。例如，省委、省政府把“推动出口回升”作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来抓，出台实施一系列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政策措施。省商务厅下半年新增20个传统主销市场展会，帮助企业开拓重点市场、争取订单，省财政增加资金给予支持。

三是全省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显然，前三季度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增长19%、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增长6.4%、航天航空技术增长15.3%；同时对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需求增加，有利于全省外贸发展基本平衡。

四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4个月下跌，从去年12月至今年10月，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累计贬值4.38%，非常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出口。

最后，江苏的投资环境日趋优化，使得外资对江苏的投资热情不减，江苏的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规模与质量始终居于全国前列。

但是，十三五前期的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世界经济将会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有可能发作，最直接的影响一是外需拉动减速，二是国际金融市场不稳，三是利用外资的门槛增高，四是保护贸易的措施增强，五是TPP、TTIP等区域FTA对未来国际规则的影响等合力，将会使得全球的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现象长期维持、从而使得十三五前期的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不能乐观，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会遭遇一些突发事件。

其次，江苏既有的某些发展优势弱化严重。在这一方面，近期国际大宗商品如铁矿

砂、天然橡胶、成品油等价格低位反弹，开始进入上行通道，而这些商品又都是江苏数量增长较快的进口商品。另一方面，当代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回流现象严重，有可能不利于江苏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增势明显，大大冲击和影响江苏的出口成本优势。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将会使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及其订单加速向中西部地区及东南亚国家转移。

第三，我省外贸出口主体是工业制成品，受到国际需求萎缩、贸易摩擦，以及国内去产能等方面的影响，出口增长将会面临挑战。特别是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面临低端化危机，高科技产品的劳动密集型或低附加值环节的现象目前在出口企业中普遍存在，如果不能有效地扭转改变，十三五前期的江苏外贸出口将会难以维持目前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水准。

第四，外资利用效率方面存在制约瓶颈。全省外资企业经营状况虽然普遍较好，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经营状况不够理想，主营收入同比出现下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投资增长快速，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有2个重点推进的外商投资项目，由于涉及国家部门监管流程和市场原因而出现较多问题，进展相对停滞，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第五，突发因素和过去矛盾的累积交互作用。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英国脱欧、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难民潮对欧盟经济的冲击、美国选战后的政策动向、韩国闺蜜门干政的影响等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经济与政治，从而对十三五期间江苏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海外布局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江苏省在国家的一些重要开放试点中的缺席，有可能使得江苏先行先试、充当领跑者的能力和效应大打折扣，也会对十三五期间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后续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 三、加快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建议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和加快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第一，转换思维水平，正确认识和评判当前的发展困难。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趋势比较严峻，不容乐观。但是，必须强调转换思维水平，正确认识和评判当前的发展困难。例如江苏引进外资连续12年全国第一，最近被广东省超越。但是我们对引进外资不能只看数量，更要看重质量，看重引进外资的利用效率，尤其要看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带给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要看到目前江苏乃至全国正处于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发展阶段，并且中国的外贸降幅相对于其他国家要低得多，相对外贸地位处于上升状态，尤其是江苏的贸易结构在优化，进出口规模的降幅明显收窄，发展相对较好。

第二，坚定不移地通过“走出去”破解困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和向纵深发展。江苏开放型经济在这一方面有着三大突出的优势，一是全省的制造业基础厚实，二是承包工程的优势明显，三是江苏的140多个园区发展不断升级，同时初步形成了对外投资综合服务的平台体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因此，十三五前期将是江苏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比较好的时期，必须坚定不移地通过“走出去”破解目前的发展困境。

第三，继续深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一般贸易的主体主要是民营和国有企业，加工贸易主体更多的则是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具有“游牧民族”特性，择成本洼地而居，哪里要素成本低就往哪里发展。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竞争优势有所弱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相应减缓，订单的向外转移速度明显加快，以致目前全省加工贸易降幅较大，从曾经占半壁江山发展到现在约占1/3，是当前稳增长的重点和难点。因此，要继续深入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研发设计和创建自主品牌，发展境内外维修业务，积极争取逐步扩大全球维修业务试点范围，推动苏南地区加工贸易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加快南北共建园区建设，支持苏南地区加工贸易产业有序向苏中、苏北地区转移，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落户园区。

第四，开展并扩大三种外贸新业态试点。经国家批准，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单位，要在这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试验的推进，尽快探索出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新体系。同时应当抓住“互联网+”的发展，深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三种外贸新业态的试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开展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的先行先试试点，建设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和出口产品公共海外仓，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配套产业链，引导传统外贸企业应用跨境电子商务开展

进出口。通过试点工作的全面推进，实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展，并逐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有效地促进十三五前期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第五，发挥双向投资对外贸的促进作用。目前江苏省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居于全国前列，同时在“走出去”对外投资方面也有较高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十三五前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频繁，江苏还应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提高国际化和法制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以便创造更具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并采取措施确保外商投资准入的各项特别管理措施能够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双向投资对于外贸发展的促进作用，产业选择不仅要重视高新技术产业，也要兼顾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使用国内原材料和设备的“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产品海外销售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让对外投资成为推动江苏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有效拉动江苏的外贸进出口。

第六，组织研究必要的应急风险防范预案。随着江苏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会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特别是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而引发的突发事件，更会对十三五期间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组织人员进行必要的应急风险防范预案研究，同时加强对全省“走出去”企业的应急风险防范的指导工作，以确保十三五期间江苏开放型经济实现平稳的发展。

(省外国经济学会研究会)



# 江苏保险中介发展研讨会综述

2016年11月3日,省保险学会与省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在江苏保险综合大厦六楼会议室联合举办“凝心聚力·合作共赢”——江苏保险中介发展研讨会。会议邀请监管部门、中介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高校的专家代表,从多个角度为促进江苏省保险中介行业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和设想。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 一、完善保险客户信息共享,建立开放数据库

新一站保险代理公司运营总监吴显敏认为,由于互联网的开放化,投保人层次不一,为防止骗保行为,建议建立数据库,对可疑保单进行筛查,对黑名单用户进行全行业公开。新华人寿江苏分公司团险部经理王明星认为,适应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迅猛、增长量惊人的态势,保险公司与中介公司等应将保险数据汇总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分析统计,作出对行业发展有利的预测与战略引导。

## 二、从严要求,加强保险中介行业监管

随着互联网保险业的不断壮大,互联网中介公司应运而生。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闫海峰教授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保险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为,目前互联网保险中介行业在蓬勃发展,互联网的智能化对监管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提议以互联网保险中介为监管对象,对其资质、业务、产品备案等进行监管,增强对投保人的保护力度。东南大学医疗

保险研究所张晓教授认为,互联网技术对现有的治

理方式、制度是一场挑战,互联网保险中介行业的发展也需要新的监管制度。吴显敏则提出互联网保险中介平台应加强风险管控。

## 三、不忘初心,保险姓“保”

张晓教授认为,保险中介公司的出发点应该是加强自律,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为保险行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让保险回归保障功能。人保财险销售管理部和个人营销业务部副总经理刘芳认为,应开发适合投保人实际需要的保险,中介机构要搭建好投保人和保险公司联系的桥梁,以符合“保险姓‘保’”的要求。

## 四、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保险中介行业认可度

目前,全国保险中介行业协会正在筹建中。保监会施强副巡视员指出,全国保险中介行业协会成立后,将着力加强保险中介的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平面、网络等)介绍代理公司、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的概念,扩大社会公众对保险中介行业的认可度,给投保人提供更多可信的购买保险的途径,同时加强行业自律,保障投保人的合法利益。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高级经理杨渝勇认为,银行与保险行业的合作,面临着银行保险代理人缺乏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问题,应加强对银行保险代理人员的培训,增强其专业性,从而更好地宣传保险的作用、提升投保人对保险的认可度。

## 五、完善制度建设,细化保险行业发展细则

(下转第87页)